

同鸟斋集

秋陽 著

徐子兄雅鑒
乙酉春日李陽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秋陽
著

岡島齋集

貴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闻鸟斋集/秋阳著. —贵阳:贵州民族出版社,2005. 6
ISBN 7-5412-1282-2

I. 闻... II. 秋... III. 贵州省—概况—文集
IV. K927.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3787 号

-
- ☐ 出 版 者:贵州民族出版社
 - ☐ 出 版 地:贵阳·中华北路 289 号
 - ☐ 责任编辑:李榕屏
 - ☐ 装帧设计:新苗 珑殷
 - ☐ 印 刷:贵州创兴彩印厂
 - ☐ 开 本:850 × 1 168 毫米 1/32
 - ☐ 印 张:25.25
 - ☐ 版 次: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 - ☐ 印 次: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 - ☐ 字 数:570(千字)
 - ☐ 定 价:48.00 元
-



秋阳其人

贵州省炉山县（今凯里市）万潮乡人，生于牛年腊月初九（1926年1月22日）。姓徐，名鸿钧，字文和，别号平。以号行，常用笔名秋阳，还有徐鸿、江鸟、平一、于非等。从小学读到大学，在大学读的是农艺系。其间还学过电话、测量，当过接线生（话务员）、绘图员、教员、机关干部、记者、编辑。职称副编审，曾主编《花溪》月刊及《花溪文谈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名入《中国文艺家传集》、《中国当代著作家辞典》、《中华人物辞海》。出版《山居鸟言录》、《谢六逸评传》、《李端棻传》、《苗疆风云录》等。所著多次获贵阳市及贵州省政府奖，有的由北京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，有的流传海外，皆非其所料也。

责任编辑/李榕屏

装帧设计/新苗

珑殷

题图/李澄

题字/秋阳

扁舟逐浪去

短篙厚掌还(代序)

我的文字生涯,即以写作为职业,是从记者开始的。1958年,《贵阳日报》在“大跃进”声中创刊,从市、区两级机关抽调干部充当编辑记者,我有幸入选。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就有当记者、作家的狂想,现在竟不期而至,岂非命运的安排?不是的,此乃时势之所需,与个人的作为相适应的结果。看起来像是心想事成,认真说起来,却不是一蹴而就。

既然有当记者的愿望,现在就要实现,应当高兴才是,不知怎么反倒惶惑起来。一则,兴趣爱好、成名成家,已经批得臭不可闻,岂能再去惹上一身臊;再则,因为“肃反”受到审查,虽然查清了反,更应夹紧尾巴做人,不能松劲。

那时,我是贵阳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。革命干部必须服从组织分配,不能讲价钱,便去报到。困难时期,《贵阳日报》停刊,转到《贵州日报》,一干就是20年。十年浩劫之后,调《花溪》月刊,亦编亦写,又当上了作家。退休后仍不弃笔。尽管文艺与新闻不能等同,但留下来的都是白纸黑字,列一写作年表,录以备忘。本书收入的篇什,留待“后记”中去交代。(见“附录”)这里但说手中的笔是怎么舞起来的。

青春年华,正当中西碰撞、新旧交替的大时代,传统与现代兼容,文言与白话间杂,复借助课堂教学,书报杂志的传播,广为

流布。沐于其间，濡而染之，遂将其所得为我所用。有两方面，一是文化修养，二是生活阅历。二者融会，便生出一种能量，即写作。有话要说，遂发而为文。由于每个人的处境不同，路途殊异，酸甜苦辣，尽显风采。能混迹其间，莫不是三生有幸也耶！

岁月蹉跎，逼近黄昏。回首往夕，既为苦心劳作，秋收有成而欣慰。又因山径崎岖，辗转折腾而感慨万千。前贤有言：“天高任鸟飞”，而又“高处不胜寒”。其远大的目光，广阔的胸怀，不畏艰险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，很能鼓舞人，激励人。其用词既形象生动，而又简洁明快。然而，现实生活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，常常是身不由己，动辄碰壁，灾祸临头。笔下曾经有过诉说（见《新苗的生日》、《花溪觅踪》、《军人梦的破灭》），因为有的词犯讳，不能直书。现在有了巴金大师说真话为先导，报刊电视“实话实说”的范本，不妨仿而效之，重新赘述一遍，并把老祖宗也请出来，追根溯源。

曾几何时，讳言名利，狠批当官思想，诅咒升官发财为腐朽。只能学张思德烧炭，甘当一颗“螺丝钉”，不能有所奢望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更是登峰造极，在家养鸡生蛋可以，决不能拿到市场上卖钱。把自由市场斥为资本主义，扫除之唯恐不净。各级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一个个挂牌批斗。改革开放，忽而逆转。官与利并行，竟成大潮。岂不是在与历史开玩笑？！

官是历史的存在，有国家，有军队，有政府，有党派，一句话，凡有人群，有公务，就得有官。历代的官都是吃皇粮的，当了官，功名利禄一应俱全，很有吸引力，于是趋之若鹜。日久弊生，贪官、酷吏，祸国殃民。有识之士遂起而改革官制，又以官名太俗，改称公仆、干部、公务员。改来改去，仍无善策，因为官制还不能取消。孙中山先生说得好，政者，众人之事也。众人之事，总得有人来办。为众人办事的人，就是官。

孙中山先生痛恨贪官、酷吏，倡言要做大事，不要当大官。善哉，斯言。不幸的是，其善意为恶人所欺，国权被窃，南北对峙，再次革命。由此反正，该当的官，尤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官，一定要当，决不能禅让。

当官既是一种职业的选择，又是社会历史的需要。仿佛记得西方一位伟人曾经说过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不是好士兵。问题是当什么官，怎样当官。参加革命的时候，把当官思想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，想当记者作家，有名利思想，是个人主义，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不相容，像清除垃圾一样扫地出门。忠诚有加，不免盲从，因为缺乏知识，莫名其妙。

多读了几本书，涉世日深，又读了族谱，才恍然有悟，原来我想当官，并非偶然，既是家族传承，亦是顺应历史潮流，而我们徐姓本来就是个仕宦宗族。远的不说，自明以降，武将文臣，几乎历代不绝，功名利禄，载诸谱籍。小时候常听祖父自言自语地说，“长江大河两条船，一条为名，一条为利”，不甚了了。有所悟之后，惊叹他老人家对人生感悟之深透。其实就是积宗族和他自身历旅之警世名言。中国士子历来重名轻利，而我的祖父却把名和利看得同等重要，两者不可或缺，确乎难能可贵。

民以食为天，求利是人生的第一要义，首先得吃饱肚子，才能生存。利之得其源有二：劳动者，凭借双手创收，自食其力；读书人，学而优则仕，当官吃俸禄。这两种人并非天造地设，一成不变。劳动者发奋读书，也可以登堂入室；做了官，一旦宦海沉溺，穷愁潦倒，还得归田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，首先就是要实行民生主义，此其伟大之所在。

重名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。为官者讲求政声，武官不怕死，以马革裹尸为荣，缴械投降可耻；文官不贪财，宁可饿死，也不吃嗟来之食。无论文武都以失节为最大的耻辱，视声名狼藉为最

悲哀的下场。长江大河上的两条船,相伴而行,不可须臾或离。水可以载舟,亦可覆舟。翻船的事所在多有,一着不慎,倾家荡产,身败名裂。

徐氏宗谱,将其族源追溯到三皇五帝,不免有攀附之嫌。有史可考者为徐偃,称王东夷,威震一方,族声丕振。后为楚所灭,复遇海潮之患,族众四散流徙。元末,徐惟勤一支定居安徽濠州(凤阳),在这里生子二,长名达,次名陞。以农为业,家境贫寒。徐达弃农从军,随朱元璋转战南北,为大明开国元勋,任左丞相,官居一品。其弟陞官封二品武功将军。陞歿,其子胜袭父爵,于洪武十四年(1381)奉调南征,以千户指挥职(正三品)入黔,定居平越(今福泉),成为贵州一支徐姓始祖,世代承袭。10世天祥,袭指挥职,由都匀分抚炉山(今凯里)大坪。祖父培龄为20世。

徐达位居高官,为明太祖所器重,称其“不居功,不自傲,不好女色,不贪财宝,公正廉明,无懈可击,像日月一样光明,只有大将军一个人”。(见《明史·徐达传》)朱元璋对大明有功之臣,几乎都杀了,徐达亦在劫,险遭“蒸鹅”之祸。大难不死,乃不幸中之大幸也。

徐胜世袭三品武将,志不在官,立身理家,获羊酒奖劝。其族尤重风教,以孝义齐家,严格家规。立“六戒”,一戒不孝,二戒不节,三戒犯族,四戒争讼,五戒奢侈,六戒淫欲;“三要”,一要重农桑、正学术,二要严婚姻、明嫁娶,三要笃戚属、和邻里,一禁子弟非为。因生于乱世,纵有鸿鹄之志,亦翻不胜折。

其后裔在大坪建有徐氏宗祠,春冬两季阖族共祀,追念不忘;编修徐氏宗谱,追根溯源,世系不乱,意在光宗耀祖,世代传承。

入黔始祖以客籍汉族传宗,年多月久,遂变服易俗,而成为

另类贵州人。有的支系与土著联姻,而改变族性,但姓氏不变。

然而,天不从人愿,战乱频仍,每况愈下。说起来徐达的长女是成祖仁孝皇后,还有两个女儿是王妃。朝中有人好做官,理应得到宠信而飞黄腾达,相反,族人效忠朝廷者日渐减少,官阶品级递次下降,武官多死于兵燹,葬身异域;读书人,“虽好学不倦,生不逢辰”,“欲坠笔不可,欲贸易而不能”,只得“以硯田作良田”,“以舌耕作菜羹”,艰难度日。

舟溪一支,19世炳仁公有幸成进士,还留学日本。纵有为国“扫除”“群狼”,收复“弃地”之志,而不能;有为民掘泉淘金之愿,亦不可得。因见仕途险恶,不肯屈膝折节,又不愿空了一生,只好教书,以育人为乐。

我们万潮一支17世登坤公,生于乾隆末,已身无官职,家无资财。靠养牲酿酒,“粗具家室”,因为少读诗书,为置田产被欺凌。咸同年间为避战火外逃,中弹身亡,葬于长堰。

18世树基公,无力入学,勤劳耕种。为了后世不再受制于人,遂忍口膝食,延师教授子侄,使其知书达理,重振家风。不幸风雹将房屋摧折,书籍瓦角不存,无以为继。接着硝烟再起,家人两地逃生,树基公辗转奔至四川通州,抛尸异乡,忌日、葬所均不可考。

19世德绍公,于危急存亡之际,逃到省城贵阳,寄居改毛,“竭力耕耘”,又因天不时地不利,秋收仅得八斗,“苦况难堪”。咸同战后,回归万潮,重振家业,抚育子孙。

20世培龄,字立斋,我的祖父。生活在清末民初,刻苦芸窗,学业有成。但三次院试不第,二考朱学院始得增补。复因康梁变法夭折,六君子罹难,愤而悲叹“国势不可为矣,已具身乎羽毛者尚如是,新进者曷敢再立门径。于是专意林泉,怡然以养亲授徒为乐”。但对生徒仍抱以希望,常训勉之曰“天下治乱,

恒相循环。吾不幸而值其时,三十年后必有光明之世”。激励他们不要灰心。他既不满于增生的无廩米,更无官职,复因“科举废弛,未孚素志”,而耿耿于怀。

地方上量其资质和声望,选他为县议员,“未前充当”。民国肇兴,县令委以团首,办理一年而辞退。再委区长,“迭辞卸肩”。三委经费局协理,一年后以“母年衰稟请辞退,坠笔行商。洪江往返,迭受波折”。又不幸,“家被贼掳,志气未伸”。四委(乡学)校长兼任选举管理员,情义难却。时值省垣军政派系纷争,刀枪相交,兵匪窜扰,骚乱地方,遂协同官绅,治理整顿,使得安靖。

立斋公志气如何,不得而知。据其生徒张圣铎撰写的《立斋公传略》称,民国20年(1931),乡人王海桥以师长治兵陕中来函相聘,恰触先生夙志,于是邀诗友李育三同行,买舟东下,前去应聘。想来不过是幕僚之类,而愿去就任,说明其期望并不很高。然而,就是此区区幕僚,亦不能得志。行到南京却因“军事未靖”,丧气而归。

立斋公几次出门都是乘船,先前由清水江东下洪江,经商折本。此次长江之行,所乘当是更大的船,千里谋官,官气未闻,中途而返,其心灵的创痛可知。他以行船譬喻人生,入木三分。经商聚财受挫,求取功名亦不可得,退而设馆授业,四乡学子,慕名而来。先后40年,乡党名流多出其门。

21世锡桐,字绍虞,我的父亲。因受立斋公的影响,追随其后,弃学从商,不幸遭劫,复遇大雨,惊寒致死。

我为22世孙,3岁失父,没有受过传统的“庭训”。小学读的是新学,但亦在祖父的私馆受到联语的熏陶,学习对联,讲究对仗和音韵。从小学到中学,语文课要求背诵、默写,作文练习,有的级任导师还要加写周记。因此熟读不少名篇、诗词,所写的

作文、周记还能及格,得到先生的夸奖。于是对语文产生了兴趣,还与同学合办壁报,课外习作。若能按部就班地读下去,也许在语文上会有所成。可是,初中尚未毕业,突然发生变故。

父祖两代虽然屡遭挫折,幸得置有产业,生计有着,供我读高中,是可以的。而母亲急于让我成家,初中毕业回家当个小学教员就可以了。我想再读高中,将来进军校,当军官。因为日军入侵,国土沦丧。国人流离失所,机关学校内迁,我读初中的都匀,就有迁来的炮兵学校,同学中有不少流亡学生,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。学校音乐课教唱抗日歌曲,国语加教抗日诗文。学校隔壁就是军校,学生们加紧操练,军歌嘹亮。一旦警报拉响,即便正在上课,也得紧急集合,往郊外逃跑。学校生活深深地沉浸在抗日救亡的氛围里。谁愿意做马牛,谁愿意当奴隶的呼声,常在耳边回响。情动于中,遂写了一首歌谣,题名《忆故乡》投给一家报社,刊登出来。其中有句云“血水的故乡”,抒发悲愤,表达心志。

如若回家,不能再读书,希望将成泡影。于是与同班的伍姓同学结伴,去了桂林,想在那里继续升学。但因此行为有违母命,伤了她的心,断了读书的路。见有空军军士学校招考,便去应试。不能当军官,当一名空军军士也不错,而且还能腾云驾雾。可惜体检不合格,被刷下来了。后来考取交通技术人员训练班,学习电话业务。在这里亲眼目睹敌机在城市上空投弹,顿时硝烟弥漫,多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。就在我们躲飞机的铜鼓山前,广西大学的一辆校车被敌机俯冲扫射,要不是有山洞隐蔽,我们亦在劫难逃。

训练班结业,分回贵州当接线生,有固定职业,可以养活自己。然而,成天坐在交换机(总机)前,给用户接转电话,觉得枯燥。就又考取一所测量学校,前称中央陆军测量学校,毕业后可

以在军事机关任职,有望实现“军官梦”。

我读的是大地测量班,入伍期3个月,专业培训1年。课堂教学结束之后,正在花溪实习野外作业。突然“黔南事变”,独山报警,学校再次北迁。于是跟随全校师生沿着黔渝公路,徒步行军,亲身经受一次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,复增同仇敌忾之恨。

到达重庆北碚,学校在澄江镇安顿下来,准备毕业考试。却因对区队长的差派不满,遭到漫骂毒打,怨愤难抑,将他上告校方。同学们闻讯,纷纷涌向校长办公处,强烈要求惩处打骂学生的官长。打人者难辞其咎,受到校方的斥责。

正义既申,应待毕业分配任职,以遂心愿。但想到这位官长当众受责,不会善罢甘休,不如一走了之,免遭报复。于是请求退学,得到允准。教专业课的陈、钱两位教官,同情我的遭遇,向教育长夏坚白说情,得到他的关照,把我推荐给一位地质学家黄汲清,到北碚他所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当绘图员,还给予大学毕业生的待遇。因祸得福,本当尽力以报,可是区队长向我挥拳的影子,常常浮现在眼前。决心要雪受辱之耻,便又考取陆军机械化学学校,到潼南去受训。既可实现当军官的理想,又能摆脱屈辱的地位,不再受人欺。

到校后却大失所望。所谓“机械化”,不过就一辆旧坦克,还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。平常的军事训练,除了操正步,就是上山扛树木、搬砖瓦,为建校舍出工。那“乌龟壳”趴在河滩上,还没来得及上前看一眼,日本就宣告投降了。喜讯传来,本当欢庆胜利,而校园里却无庆祝的迹象,反而躁动不安起来。风传还要“打内战”,同学之间背地里议论,不知如何应对。我想的是,抗战结束了,再当军官没意思,更不希望“打内战”。事不宜迟,遂在躁动中趁管理松弛之机,溜之大吉。是夜,皓月当空,有两位同学护送,“暗度陈仓”,逃之夭夭。复在大白天,乘大木船,渡

涪江转嘉陵江,经重庆,回到贵阳。亦如立斋公的渡长江,但却惊险得多!当“逃兵”抓回去是要受军法惩处的。那时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子野劲,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而能死里逃生,命不该死!

军人梦的破灭,值得庆幸,但为前途计,还得读书,从头再来。于是考取一所私立中学,校名力行,读高中三年级。校长王桂浑思想开明,号召学生读鲁迅、高尔基的书。读后深受教益,遂萌生当记者、作家的念头,要学鲁迅用笔说话。并与同班同学二李合办《力风》周刊出版壁报,指点校园生活,受到校方的鼓励和赞扬。

好景不长,半年后王校长和他的夫人回青岛老家。临行前,我们全班同学与他饯行、合影留念。我请他留言,他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“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”,永记不忘。他走后,《力风》仍如继往,对校事说三道四,不想竟触怒了继任的校长。我在一篇刊稿中涉及校风,最后说了一句“尚能再思”,而“再思”就是这位校长的大名。于是布告栏上贴出一张通知,警告说,凡未缴清伙食费的学生,不准参加期中考试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不参加考试,没有学籍,便绝了升学的路!

我的母亲不久前去世,负责供给我的兄长又出门在外,一时难以济急,告贷无门,又不幸而沦为他人的瓮中之鳖,任其拿捏。不得已而忍痛将所有张贴过的壁报稿拿出来,放在校园里当众火化,让苍天去评判。于是收拾行装,愤而离校。出了学校,一时茫无所向。英语老师刘秉纶为我的被迫出校不平而又惋惜,便带我去找主办单位申诉,希望能有个着落,亦不可得。便收留我在他家食宿,支持我复习功课,准备高考。

志趣转向后,本当读中文系,但又觉得古文难啃。好心人劝我学医,将来职业有保证。我怕学不好,不仅不能救死扶伤,反

而贻害于人。便选了教育和农艺。发榜时,两所学校都榜上有名。按我的家境读教育最合适,可以享受全公费。孰料贵阳师范学院没有读成,后来进了贵州大学,读的是农艺系。学费经过多方设法,县里还给了一笔助学金(给本县学工学农的学生),可以应付,不再为膳费着难,安下心来读书。课堂上,动物、植物、绘形、解剖;下课后,呐喊、彷徨、学会、读书会、习作、投稿,倒也忙得有趣。

1947年秋,为炉山中学聘请一位体育教员,他因人地生疏,要我作伴,于是休学与之共事。没几天,便有传闻,说他有什么嫌疑,甚至当面问我是否异党。请教员本来是受校长之托,所请的吴绪成,是同班同学曹文灿推荐在他家乡(平坝马场)教书的教员,而且还把自己的侄子曹秉礼托付给他,带到炉山中学读书,当是信得过的。不知“嫌”从何来?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。其实是怀疑我,事后得知,确曾有人到乡公所探听我的行踪。为了家乡教育,甚至不惜牺牲学业,反遭此不白之冤,何苦来!春节一过,遂不辞而别,又回到花溪。

这时,休学期未满,还不能复学,便到贵筑县党武乡的一所保国民学校教书。乡长是力行中学的同班同学,生活方便。他让我住在一间民房里,楼下是牛圈。白天在教室里,给放牛娃“念经”,晚上与牛为伴,挑灯夜读。每月到县政府领津贴,一石谷条,卖成钱,便进城逛书店。见有王士菁写的《鲁迅传》,便买了一本,正好一石谷条的钱。

这本传记,是将鲁迅的生平和他的作品穿插起来编纂的,对书中的内容摘录较多。此前读到的单行本,零散不全。现在一书在手,便将鲁迅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,对鲁迅的认识又进了一步,受其思想的影响亦深了一层,更坚定自己走人生之路的信念和勇气。

复学时却因文凭一事受阻，几经周折，始准注册，但却留下一条尾巴：“正式文凭后补。”既又跨进校门，读书为重，“文凭”如何，由它去罢！我的读书，主要是为增长知识，谋得求生的本领。由于四处碰壁，读了不少学校，都不了了之，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，而又不知去向，唯有一张大学成绩单记录我一个学期的各科考试得分，没有不及格的，其中的德文还是选修课。证明我是正经读书人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因教德语的老师是德国人，给后来的“肃反”增加了一条说不清楚的“关系”。

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贪官污吏的作践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天怒人怨。同学中有地下党人，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传播民主革命思想。国共两党之争，越演越烈，战争不可避免。这时才明白，内战是怎么回事。我急于想寻找转机，便去信青岛向原贵阳力行中学的王校长求助。他回信说，祖国大地迟早是要被火洗的，不如留在当地参加火洗后的建设。

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，国民党的统治积重难返，货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教授教授，越教越瘦。一麻袋纸币买不到一升米，正嗷嗷待哺。学校食堂里，大学生为争一口稀饭，竟打得头破血流。这是什么样的“20世纪”！反饥饿运动应势而起。

1949年3月，春风浩荡，校园里地火奔突，学生集会，教授演讲。罢课，罢教。引吭高歌：“山那边哟，好地方”，“团结就是力量，定叫那不民主的制度死亡！”响亮的歌声，激动人心。我也受其感染，跃跃欲试。

3月26日，全校师生，浩浩荡荡，徒步进城，游行示威，向省政府请愿，要求改善师生生活。那时我已经结婚，住在花溪镇上的一间民房里。妻正在分娩挣扎，助产士临床待产。眼见游行队伍从房前经过，想去参加又脱不开身。待到胎儿坠地时，已经追赶不上了。为了纪念这一天，我们给她取名新苗，期待她在火